

右派。但据清华社会学系校友王胜泉回忆，反右后有一年他去陈先生家拜年，谈话中涉及当时的中国人口问题，陈先生十分肯定地对他说：“中国人口太多，就会给经济建设带来负担，绝不会因为人多就力量大。中国人口规模非得控制不可。”王胜泉校友当时听到这些话大吃一惊。因为“人多力量大”是毛泽东的话，陈先生的这些话当时是被看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反右时他的这种观点便被痛

批过。然而为了坚持真理，他还是要说，足见他的骨气。另外，陈先生也不是不注意生活情趣的人。他非常喜欢打猎，而且猎技高超。有一次，一枪打下两只山鸡，每次向人谈起，总不禁笑逐颜开。有一次我去他家拜访问安，他招待我喝的茶充满玫瑰花香。

（摘自《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

## 李济——失踪的大师

○施雨华

李济是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他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完成了第一次中国人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在半个世纪里，这位“中国考古学之父”主持了安阳殷墟的发掘和研究。他一生从事考古，始终不曾忘情的是寻找“中国人的始源”，但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他的名字在大陆销声匿迹……

1928年是李济一生的转折点，也是中国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转折点。就在这一年，国民政府成立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他被任命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

10年之前，他由清华学校选送留学美国，5年里拿了3个学位：心理学学士、社会学硕士，最后是哈佛大学人类学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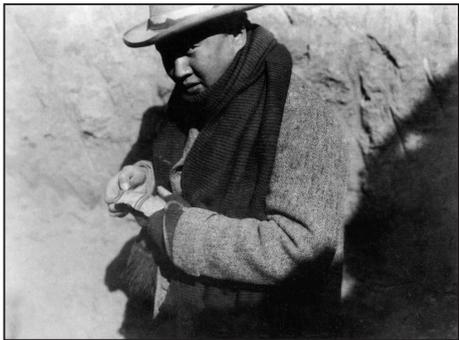
业的哲学博士——也是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有人自此习惯性地称他为“Dr. Li”。据说他父亲有一阵还给自己起了别号“博父”，在诗词和书信中公开使用，有炫耀儿子的意思，更显示老父的尊严。

1923年回国后，他在南开大学当了两年教授。之后清华学校成立国学研究院，



1925年冬清华国学研究院部分教师合影，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后排左起：章昭煌、赵万里、梁廷灿（时陈寅恪未到校）

## □ 名师轶事



1929年秋，李济在安阳殷墟第三次发掘工地上获得唯一一片彩陶时的情景

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为教授，李济资历稍浅，加上需要做田野工作，任“特约讲师”，但月薪400元鹰洋、助教一人、研究室一间的“标配”，与四教授持平。

李济拿的是人类学博士，但他一生的主要事业无疑是考古。按他自己晚年的说法，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使他“从人类学家转为考古学家”：1926年他在山西夏县发掘了西阴村遗址。这是第一次中国人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李济后来因此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同时也是史语所所长傅斯年选择他领导考古组的重要原因，他需要一个受过西方田野工作训练的人。

傅斯年为史语所制定计划，一开始就决定了两件事：一、成立一个组，以考古学作为研究中国史的新工具；二、以发掘安阳殷墟作为这个组的第一个田野工作地。他想知道刻字的甲骨是否仍然存在。

1928年的第一次试掘证实了这一点。不过这次试掘跟盗墓差不多，就地往下掘坑，只顾捡拾甲骨，其余一概不管。李济从第二次开始领导了发掘工作，此后，他的名字就跟殷墟连在一起了。许多年

后，殷墟发掘在中国社科院评选的“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中高居榜首。

安阳的洹上村是袁世凯当年失意时退居的地方，考古组到那里时他的遗产已经充公。他们就在他家中办公。李济写信给友人说：“历来做考古工作的，从没有这样幸运过。”

从1928年起，他们在小屯、后冈、侯家庄等地进行了15次发掘。在殷墟这所大学校中，李济和后来加入的中国第一个读正规考古专业的学者梁思永以现代考古方法和观念培养了众多同事和学生，其中包括后来的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和台



1936年春，安阳小屯出土大块甲骨灰土柱，李济（右前）蹲在木箱上指导，后为高去寻、再后为李景珩



1937年在桂林，为办理经安南转昆明的护照拍摄的全家福

湾史语所所长高去寻，一个时期内两岸考古界的几乎所有领军人物。他们的发掘证实了商的存在，中国的信史得以上推数百年。有趣的是，干了将近7年，发掘进行到第11次，他们才领到了官方的“第一号采取古物”执照。

第15次发掘结束后十多天，“七七事变”爆发，随后李济投入了史语所和中央博物院的迁移工作。长沙，昆明，李庄，他们带着殷墟文物、图书、仪器、档案、标本在西南绕了一个大圈子。由于医疗条件糟糕，李济的两个女儿鹤徵、凤徵，分别在昆明和李庄病逝。

经历丧女之痛，李济陷入消沉。1942年初，他写信给傅斯年，想辞去行政职务，专心研究：“数月以来，失眠已成一习惯，中夜辗转，窃念研究所自成立以来，所成就之人才多矣，而弟愧不在其列，有负知己，诚不自安，然此亦非第一人之咎。弟自觉今日最迫切之需要，为解脱，而非光辉。衷心所祈求者为数年安静之时间；若再不能得，或将成为一永久之废物矣。”傅斯年勉励他为了对得起此生，还要做一些大工作。

抗战结束，回到南京，李济以为可以安心工作了。不料几年后，他又面临一次大迁移。

### “我必须搬，你怎么样？”

国共之争的战线不断南移，1948年底，南京已是风声鹤唳。11月，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决议选一批文物运往台湾，李济受命参与押运。在他看来，只要打仗，文物就会受损；只要文物安全，放在中国哪个地方无所谓。这种近似“没有

立场”的姿态，为他招来一些骂声，不少来自昔日师友。

李济把要搬家的消息告诉儿子李光谟：“我必须搬，你怎么样？”

因为李济工作太忙，李光谟跟着祖父完成了启蒙教育。“父亲好像没怎么管过我，平常他一回家就扎到书房去了，有时候还带着没做完的工作，有时候就自己看书。我这辈子跟父亲说过什么话我都记不太清楚，次数太少了。”因此也就不太亲近。

1947年他就参加了学生运动，“家里不是很知道”。在同济大学医学院读书的他憧憬着民主和自由，觉得共产党带领民众走的路是对的。但他不清楚像父亲这样的人该归在哪一类，自己应不应该反对他们。这阵子他正请了假在家养病，犹豫再三，他跟着父亲去了台湾，一家人借住在台大医学院的教室里。

父亲想了些办法让他进台大。当时傅斯年还没担任台大校长，台大说从外校转来的，年级要降两级，还要补一年的日语。同济的课程原本只剩最后两年，他决定还是回去完成学业。

1949年2月22日他离开台湾时，母亲送到了码头，父亲头天晚上就不来送了，李光谟提前跟他道了别。当时，基隆和上海每天都有客船往返。蒋介石下野后，“代总统”李宗仁提出了划江而治的方案，许多人相信和谈能成功。李光谟当时还想着暑假就可以回家，但回到上海后，他发现情势变得太快。

两个月后入台开始受限。父母一天一封电报催他回家，五六月份，他收到母亲来信，让他回台湾商量出国留学的事，同

## □ 名师轶事

时寄来的还有买好的机票。当时一般人根本买不到票，李济找傅斯年，傅斯年想了很多办法才弄到了一张。见到机票，李光谟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原样寄回了台湾。他回信说，自己决定留下来，“看一个新社会是怎样建立起来”，以后“我们还会有相见的一天”。

他加入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对他的归来，他觉得同志们是欢迎的，但得考验考验，毕竟你去过台湾。每隔一段时间他还能拿到一小笔钱，那是李济托朋友把他的讲座教授津贴转给了儿子。

每天都有人离开这座城市，更多人静静等待着易帜的那一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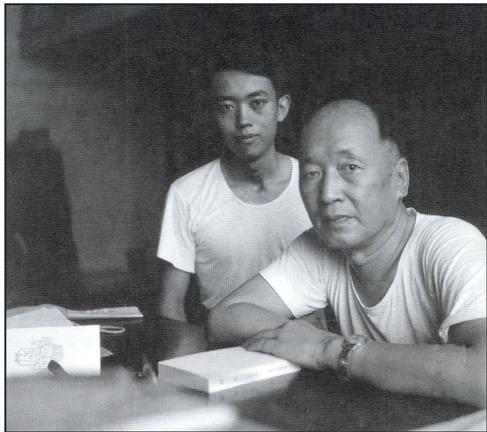
几年之后，李济在香港碰到那位朋友的女儿。她告诉李济，“李大哥去北京了，娶了太太，生了孩子。”李济问道，“他在哪家医院工作？”

让儿子学医是李济的心愿，他认为医学能探索人本身的奥秘，也是研究体质人类学的基础。李光谟没有遵从他的意愿。他考入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后转学俄文，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服从组织安排，从事马列主义哲学理论的翻译。

他的生活、信仰和价值观与共和国连在了一起，但有时内心也会隐隐生出不安，或许是因为自己走的路，与父亲的意愿相去太远了。

为了入党，为了在被劝退后恢复党籍，他总要在“总结”、“报告”中写一点关于父亲的事，但他从未批评过父亲治学和为人处世的态度。父亲一辈子都很正派，专搞学术，不懂政治。

知道李光谟的下落之后，父母靠香港



1953年前后，李济与张光直在台大

的朋友辗转和他通信。

一次，李光谟收到一封经多位亲友协助传递的信。父亲在信中提到他那几年特别高兴的事，就是在台大教了一位绝顶聪明又极其用功的学生。当时他还不知道这说的是张光直，只是心中略感压抑，好像父亲有点儿对自己旁敲侧击，但又无可奈何。

在共和国，李济的名字逐渐销声匿迹，偶一出现也是在“批胡适”、“拔白旗”等运动中作为靶子之一。他主持殷墟发掘的功绩当年曾出现在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后来就只剩下一句：“解放前也有人做过一些发掘。”

### 失去田野的考古掌门人

自1928年在广州创立，史语所二十多年里辗转迁移了9次，最后一次变动最剧，从大陆迁到了台湾。对此傅斯年态度极坚决，史语所“搬家”搬得相当彻底，图书、仪器、科学标本及大部分人员，都追随他到了台湾。但这其实是个例外，

“中研院”十几个研究所，结伴同行的只有数学所，而且所长姜立夫不久又回到大陆，其余人也陆续出国，数学所不足“半壁江山”，史语所竟成“孤家寡人”。

当时，学术界与教育界“全都属于逃难的阶级”。史语所那些图书、仪器、标本，安置在一个火车站的破旧库房里。守护这些宝贵资料的人生活与难民不相上下，他们往往有四五口家眷，却只能困居一间小屋，找不到合适居所的人有时还要在人家猪圈上头商量“一席之地”。

尽管“中研院”已大幅“减员”，但此时蒋先生的政府自顾不暇，照顾这类学术机关实在既无兴致又无能力。幸而傅斯年“应征”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彼时台大在日本教授撤出后正缺教书人，他就势把来台的几乎所有学者及教育界人士聘到台大。这样一来，空虚的教席被大批著名学者所充实，后者的衣食之忧也稍获缓解。李济应邀在台大创办了考古人类学系，使训练职业考古家第一次列入中国大学的计划，但这位中国考古学的“掌门人”，已然失去了他的田野。

不幸的是，迁台不久，“带头大哥”傅斯年就因用脑过度突然去世。

“中研院”以甲骨学大师董作宾接任所长。此时史语所的同仁对生活的艰苦倒也“随遇而安”，但不得不写一些通俗的文字谋取稻粱，虽有推进社会教育的功能，却令正经研究成了忙里偷闲。后来李济建议董作宾请在美国的胡适帮忙。胡适募得两个基金的赞助，再加上台北政府拨款，“中研院”在新址建筑新房子，才终于安定下来。

1958年，胡适应蒋介石“钦点”回台

湾担任“中研院”院长。在4年的任期内他做了不少工作，“把中央研究院的地位抬高了”（蒋梦麟语），使台湾的学者在精神上感到满足，也使国际学术界注意到了台湾的工作。4年之后他于任上去世，在葬礼上，李济送了一副挽联，上面写了三句译自英文的话：

明天就死又何妨？

努力做你的工，

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

（Be ready to die tomorrow ; but work as if you live forever.）

像是和老友倾谈，又像是自言自语。

### 30年里惟一一次见面

离开台湾11年后，李光谟没想到自己会接到这么一个任务：去见见你的父母。

1959年秋，李济夫妇应邀赴美做学术访问，预计第二年8月乘船返台。得知这一消息，大陆方面策划了几种在途中与李济“接触”的方案，打算到时“约请参观访问”，找机会把他们留在大陆。

“动之以情”的任务交给了李光谟。

“我是党内所有处分都经过了，除了解除党内外一切职务，因为我没有官方的职务。延长预备期，取消预备期，恢复预备期，留党察看，取消党籍。直到‘文革’结束我这个党籍才算恢复了。那年我还处在被劝退那么一个地位。”

珠海的一个会客室里，别离的两代人见面了。

“他们都退出去了，给我们一个单独谈话的机会。一位女同志有时会进来看，照顾照顾我母亲。谈了有一个钟头吧，我父亲多的也不问，他就问问家里的

## □ 名师轶事

孩子。我就拼命讲他认得那些人，夏鼐怎么样了，陶孟和怎么样了，还有家里的一些亲戚。我那个时候很穷，按这里给我准备的，穿得好一点。我的情况他大致也都知道，他是希望看见我们全家的人啦。要是他肯留下，当然就见面了，那会儿他们都在北京等着，随时准备去，说要是老先生多呆几天就见到了。”

“后来就吃饭，一餐非常丰盛的饭。那时候还在困难时期，我记得是把我从农场里头抽回来的，我在乡下搞社会主义教育呢。出来的时候我还带着老乡的两个玉米，生的，啃着回城的。我不记得那餐饭吃的什么了，但是记得有茅台酒，我多少年没见过。我父亲也是爱喝酒的人，他喝了两杯，说不错，挺好。后来他们走的时候，我前后左右都是穿便衣的安保人员。事先就跟我说了，千万别过那条线，就是地上划的，用颜色标了一下的边界线。当时我手里拿了一串香蕉，也是多少年没见着的水果了，我看我母亲身体不好，我说你带着路上吃吧。我就想递给她，结果走到边界线了。旁边的人示意，



1950年李济夫妇摄于台北温州街住所

指指那条线。他们过去了，我不能过。”

### 最难使之满意的老师

台大考古人类学系系主任，李济当了10年。他认为考古不是与社会脱节的学问：

“专家”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似乎带些神秘性；“过分专门”已有讥讽的意义了。但是社会，尤其是现代的社会，是崇拜科学的。考古学与民族学都是科学事业，若有过分专门的嫌疑，也许还是它们的专门专得不够彻底的缘故吧！真正的专门学术，没有与社会完全脱节的；试看考古学如何影响了历史，历史家的意见如何影响了现在国际的关系！民族学如何影响了社会以及政治！这些影响都可以放射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上去。

而发挥影响的开端，必须是这些学科本身的培植和滋长：

中国学术在世界落后的程度，只有几个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方才真正地知道。我们这一民族，现在是既穷且愚，而又染了一种不可救药的，破落户的习惯，成天的在那里排（摆）架子，谈文化，向方块字“拜拜”——这些并没什么“要不得”——真正“要不得”的是以为天地之大，只有这些。

但是，每一个中国人——我常如此想——对于纠正这一风气都有一份责任；所以每一个中国人，若是批评他所寄托的这一社会，必须连带地想到他自己的责任。据我个人的看法，中国民族以及中国文化的将来，要看我们能否培植一群努力作现代学术工作的人——真正求知识，求真理的人们……

李济就像一个大家庭的家长，为考古人类学系创立了一个优良传统，并通过师生关系把这个传统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同时他也是一个“最难使之满意的老师”。本系的学生，最初两届出了李亦园、张光直等人，此后逐渐令人失望。李济讲课时感觉有好些新问题，听讲的学生却无人发问，问题也就没“滋长起来”。某次一年级年终考试，56位学生只一半及格，本系的12位，最好的也没到70分。他心里很不舒服。与之相应，有年轻人显露天分，他便不遗余力提携他“上路”。

他生平最得意的学生，一个是夏鼐，在大陆成了共产党“又红又专的考古家”；一个是张光直，台大毕业后去哈佛读人类学——和老师当年一样。李济面对他就像父亲面对儿子，严厉中饱含寄望。在给张光直的信中经常出现的话题包括：哈佛人类学课程的教法、参考书目，大陆新近发表的与古人类化石、考古有关的论文，国外关于中国史前文化的讨论、相关著作。因为在美国容易找到的材料，“在台湾难得看到”——他从未间断地关心着岛外考古学的进展。

做了许多年教师，他养成一个习惯，“看见了学生们，就想到中国的命运。他们集体的思想、行为与人生观，似乎就是中国前途的一个缩影”。一次，他在一个场合意外地听到一群没考取大学的青年哼唱民歌，开头几句是：“有些人的儿女，在美国结婚；有些人的儿女，在台湾当兵！结婚的儿女们，快成美国人了；当兵的儿女们，要回大陆去……”

这类印象压得他有点透不过气：是不是现代的青年中国人都不愿意做中国人？

他希望出国的学生能陆续回到台湾，“我想我能安置他们”。对寄望最多的张光直，更是在信中屡屡催促。张光直说他对回台湾后的远景颇有一番理想，顾虑的是，理想会被实际所折磨。李济“很愿意效劳”，为他筹划回台后的工作和生活，并答应他，“只要有可以实行的计划，我一定尽我的力量促其实现”。

“美国虽好，不是青年人久恋之乡”，因为“作学问是要自己开辟一个境界的”。“我最亲切的希望，为能帮助你们这一群年青力壮又有作学问志趣的，把傅孟真先生卅年前所燃的这把新史学的圣火负责传递下去。”在他看来，台湾的工作环境不如海外，老一辈诚然有责任；但民族要延续下去，有才干的青年人如果都留在海外，民族的前途还有何指望？

但史语所“将近十八万卷的书，卅万张以上的档案，二万五千片以上的有文字的甲骨，十万件以上的考古标本等等”，终于没有等来那个他寄望最多的得意门生。1960年拿到博士学位后，张光直投奔了耶鲁。

最终，继承李济衣钵的是他从大陆带到台湾过继的次子李光周。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毕业后，他也去美国深造，最后回到台大执掌考古人类学系。但李济去世后几年他也不幸病逝。

### 决定命运的精神负担

当年的伙伴或留在大陆，或远走海外，或改行转业，对李济而言，整理出版殷墟的研究报告是一件无法移交的“精神上的负担”，“若是有一件事，决定我的卅年来的命运，也就是这一件事”。然

## □ 名师轶事

而，肩上的事情越积越多，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躲开它们。“现在所抱的也只是愚公移山的人生观……”

1955年董作宾因为生计问题去了香港，李济接任了史语所所长，也许出乎他本人的意料，这个所长一做就是17年（卸任后为“终身研究员”）。

台湾当局一度以“反共复国”为名，要求学术为政治服务，史语所也受到影响，间谍情报人员、经过胁迫而参加的人员、特意混进来的人员出没其间。李济再三要求学术与政治“分家”，使史语所有机会成为“中研院”在办公时间惟一没有公开政治活动的地方。

所长任上，他主持出版了26巨册《中国考古报告集》、5大册《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古器物研究专刊》、19本《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上世纪70年代中，李济怀着歉疚的心情说，“我们还未做到我们应当做的一切”。事实上，他所主编的4册论文集《中国上古史待定稿》在他生前也只出版了一册。但他无疑已经就此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

后来张光直这样谈论老师，“我强烈地意识到，李济一生之所以一再拒绝美国一些大学提供职位的邀请，没有移民过去，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必须留在国内看到安阳研究的全过程”。

李济认为，人生短暂，无法兼顾太多，与其求广博，不如求精到。因此资料的汇集与长期定心致力某一范围的研究是必要的。

他的晚年无疑是寂寞的，尤其是1975年相濡以沫的夫人去世时。办完丧

事那晚，学生李亦园陪他到很晚，“他留我在他家住下来，我因睡不惯生床而没有答应他，他很有失望之意”。事后李亦园很后悔。

学生宋文薰说，“李济是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因为他的严肃，后生晚辈平时都不敢去打搅他。李霖灿是少数例外之一，他常借故去陪他聊天，因为能和他谈一谈昆明龙头村和李庄张家祠堂的人越来越少了。能谈谈安阳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1979年7月14日，李济对宋文薰说，他正计划写一本与最初的著作《中国民族的形成》同名的书。二十多岁时，他在自撰的简历中写：“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要是有机（会），他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始源出来。”

他做了一辈子考古，并不只是为了研究“古物”，始终不曾忘情的是寻找“中国人的始源”。在这一意义上，他仍然是个人类学家。

第二天，他在给学生许倬云的信中慨叹：“世事日恶，不知终于会变成什么样子。你年轻，或许会往乐观方面想；我已老衰，眼前实在看不见出路。”

半个月后，8月1日，李济突发心脏病，离开了这个他越来越觉得疏远的世界。那天，正是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成立30周年。

（转自《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12月4日，有删节）